

從長安到那爛陀：玄奘(602? -664) 的生平與遺產 首屆玄奘與絲路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序

陳金華

玄奘(602? -664) 法師是一位在中國歷史上頗為罕見的，能夠在僧界俗眾、上層精英與普羅大眾、政界與民間、整個東亞與南亞世界、七世紀以降之歷史與現實等諸多層面皆具深遠影響之人物。在僧界他是千年一遇的得道高僧，非僅以學識而炫人，其精勤超卓，事蹟與德行尤其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各國僧侶；而對在家人，即使非為佛教徒，其行高操清也足堪楷模。就學術意義而言，其所作出的傑出翻譯成就、對印度佛教學與邏輯學最新思想的忠實引介與精研、創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唯識宗派等，都已經在過去的學界研究與本書之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¹ 在民間，自其去世之日始，也日漸聖化，² 而最終演

¹ 對玄奘的學術總體評介，可以參考至少兩種學術評傳，即陳揚炯《玄奘評傳》，北京：京華出版社，1995年；與傅新毅《玄奘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除此之外，對玄奘的基本介紹，中文可另參季羨林先生為季羨林等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所作的前言。

² 對此可參王靜芬著、張善慶譯《以東亞玄奘畫像為中心審視聖僧神化歷程》，《敦煌研究》2016年第2期，第16-31頁；劉淑芬《唐代玄奘的聖化》，《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第1-58頁；劉淑芬《宋代玄奘的聖化：圖像，文物和遺跡》，《中華文史論叢》，2019年第1期，第161-219頁與第397-398頁。

變出了無數的傳奇故事，直至以《西遊記》之中的唐僧這一形象而家喻戶曉。在生前，玄奘就受到了帝王將相的虔誠擁戴；而自捨世之時起，更成為了萬千民眾頂禮崇拜的對象。然而即使如此，圍繞著這位生活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偉人周圍，我們依然可以發現諸多有待研究的謎團。即以其生年為例，即使是在二十世紀八十一年代之後的中國大陸學術界逐漸達成一定的共識之後，³ 海外的新研究還是會對此看似最為基本的問題提出了若干新的疑點。⁴ 所有這些，也正成為了我們海內外學界不斷拓展玄奘研究之廣度與深度的內在驅動力。這種中外學術界之間的天然物理屏障，更成為了我們打破軫域之隔，在長安故地遍邀各國玄奘研究的精英，費盡心力地籌辦此次國際研討會的初衷。

至於之所以選擇西安這一古城舉辦這次會議，則是基於如下考慮。眾所周知，長安（今西安）乃是十三朝古都，迄今已有整整三個千年的建城歷史與一千多年的都城史。尤其是到了中古文化巔峰的隋唐時期，⁵ 長安更是此一黃金時代的首善之都，⁶ 這種中國城市歷史上，尤

³ 中國大陸以及漢語佛教世界較為傾向於認為玄奘誕生於 600 年，比較有影響的研究如楊廷福《玄奘年譜》，北京：中華書局，第 1-12 頁中專門討論此一繫年。另可參季羨林等編《大唐西域記校注》（前揭），第 1 頁，註釋 1。

⁴ 參 Alexander Leonhard Mayer, "Xuanzang's Leben und Werk", Teil 1: *Xuanzang, Übersetzer und Heilig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2, 116 f.; 260 f., note 336. 在此處作者考證了玄奘生年的 596 年說、600 年說、602 年說、604 年說與 605 年說，並傾向於認為應出生於 602 年。另可參 Max Deeg,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Xuanzang: The Didactic Creation of an Indian Dynasty in the *Xiyu ji*," in Thomas Juelch (ed.),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Dharma Wheel: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ddhist Saṃgha and the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Sinica Leidensia*, vol. 133. Leiden, Boston: Brill, 2016. p. 94, note 3 (全文 : pp. 94-139).

⁵ 關於學界對於唐代為中國古代的黃金時期這一表述，以及此一時期中國民眾的社會生活，可參 Charles Benn, *China's Golden Age: Everyday Life in the Tang Dynas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其是在漢唐時期所具有的罕有其匹的重要性，就彰顯了對其進行歷史研究的價值所在。因此作為隋唐這一具備世界性帝國的心臟，這座隋唐大帝國乃至整個東亞的政治、經濟、文化與宗教的中心，就成為了當時東西方各國、各族人民商旅行役、居住、生活與學習之地。各種操持不同語言，擁有迥異文化背景、信仰五花八門的世界各地宗教的各國民眾，不遠萬里踏波或橫絕大漠而來，在這座千多年前的古老大都會中發生美妙的文化融合，並創造出了無與倫比的文明華章。自然，此一時期的古代長安城，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一座具備模仿性的標誌性都城，故不僅對於周邊割據政權，⁷ 甚至在遠隔大洋的中古時期

⁶ 關於唐代，至少是公元八世紀的長安城為世界上最為繁盛的都市，可參 Edward H. Schafer, "The Last Years of Ch'ang-an", *Oriens Extremus* 10 (1963): 133-79 (esp. p. 133). 關於長安中古時期的概述，可參山崎宏《唐代長安略畫》，收於氏著《中國佛教文化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81 年，第 300-311 頁；Thomas Thilo, *Chang'an: Metropole Ostasiens und Weltstadt des Mittelalters 583-904*, Teil 1: Die Stadtanlage,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Verlag, 1997; Thomas Thilo, *Chang'an: Metropole Ostasiens und Weltstadt des Mittelalters 583-904*, Teil 2: Gesellschaft und Kultur,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更便於學界利用的英文著作為 Victor Cunrui Xiong, *Sui-Tang Chang'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0. 以及較新的著作：Linda Rui Feng, *City of Marvel and Transformation: Chang'an and Narratives of Experience in Tang Dynasty China*,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在長安城的基本資料彙集方面，最為功勳卓著者，為日本學者平岡武夫與小野勝年，平岡氏長安學著作至少包括如下：平岡武夫編《唐代の長安と洛陽・索引》，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6 年；京都：同朋舍，1985 年再版；平岡武夫編《唐代の長安と洛陽・資料》，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6 年；京都：同朋舍，1985 年再版；平岡武夫編《唐代的長安與洛陽・地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6 年；京都：同朋舍，1985 年再版。平岡以上著作 198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重版。以及小野勝年《中國隋唐長安寺院史料集成》，京都：法藏館，1989 年。

⁷ 魏存成《渤海都城的佈局發展及其與隋唐長安城的關係》，《邊疆考古研究》（第 2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第 1-16 頁。

的日本也激起了在其域內複製這座絕美都城的衝動。⁸ 我們之所以選擇古都長安來作為此次會議的地點，就是希望能夠以此為原點，來推動以長安為中心的中古宗教學研究。以依託對於古長安佛教遺址與其他具備歷史研究意義的宗教場所的實地考察，以及相關宗教資料的收集，來將文本，背景，器物與實踐整合在一起，以期能夠更好地培養更多從事東亞宗教研究的各國學者。如此方能在從事相關書面學術研究的同時，也能夠徜徉於古長安的土地之上，呼吸遠古吹來的微風，利用難得的實地考察、田野調查機會，而將書面研究的知識與實地考察結合起來。走出書齋，進入田野，這正是我們“拔地入雲：佛教與東亞宗教”(FROGBEAR) 研究項目多年來秉承的一個重要研究取向。

長安這座隋唐舊都，在玄奘法師所生活的時期，也是一座宗教氛圍極其濃重的國際性大都市。此地除了彙集了數量極其巨大的佛教⁹、

⁸ 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可參佐藤武敏《長安——古代中國と日本》，京都：朋友書店，1974年。西嶋定生編《奈良・平安の都と長安一日中合同シンポジウム 古代宮都の世界》，東京：小學館，1983年。王維坤《隋唐長安城與日本平城京的比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一》，《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第101-110頁；王維坤《日本平城京模仿中國都城原型探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二》，《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66—71；另參同作者專著《中日的古代都城と文物交流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1997年；王仲殊《試論唐長安城大明宮麟德殿對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宮殿設計的影響》，《考古》2001年第2期，第71—85頁。

⁹ 關於隋唐長安時期佛道二教寺觀的總體介紹，可參曹爾琴《唐長安的寺觀及其有關文化》，中國古都學會《中國古都研究》第一輯，1985年，第144—168頁。關於長安佛寺的總體研究，除了註釋6中提到的小野勝年《中國隋唐長安寺院史料集成》之外，近年來較重要者為龔國強《隋唐長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此書主要是研究此兩代長安城中佛寺的佈局、形制特點與發展演變。對於長安城中的若干重要寺院，中文材料可參暢耀《青龍寺与密宗》，《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第93—95頁；暢耀《青龍寺》，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法門寺考古隊《法門寺地宮珍寶》，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暢耀《慈恩寺與唯識宗》，隋唐佛教學術討論會編《隋唐佛教研究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30—43頁；杜文玉《唐慈恩寺普光法師墓誌考釋》，《唐研究》1999年第5卷，第463—467頁；而日文研究則至少包括加地哲定《長安青龍寺の遺蹟に就いて》，《密教研究》1939年卷

道教¹⁰、祆教¹¹、基督教¹²等諸多宗教的寺觀院堂等宗教場所之外，

第71號，第86-110頁；古田紹欽《禪定寺の変遷と其住僧》，《支那仏教史學》1939年第32號，第77-85頁；小野勝年《長安の菩提寺とその周邊》，《竜谷史壇》，1974年第68-69卷，第43-60頁；小野勝年《長安の慈恩寺とその文化》，《竜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1976年第15卷，第96-126頁；小野勝年《休祥坊の三名刹（萬善、昭成、崇福）》，《佛教史學研究》1986年第2期，第1-31頁；氣賀澤保規《唐法門寺咸通十四年（八七三）舍利供養をめぐる一考察——あわせて法門寺「真身誌文」碑の検討——》，《駿台史學》1996年總第97卷，第29-81頁。關於長安的兩座禪定寺，則可參拙著 Jinhua Chen, “The multiple roles of the twin Changding Monasteries in Sui-Tang Chang’an”, in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4.1 (2015): 344-356. 對若干特別重要的寺院，如西明寺的研究則會更多，如小野勝年《長安の西明寺と入唐求法僧》，《佛教文化研究》1975年第17期，第1-9頁；安家瑤《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1期，第45-55頁；沖本克己《西明寺と吐蕃佛教》，《禪學研究》1993年第71卷，第85-112頁；唐浩川《唐長安西明寺建築研究》，西安建築科技大學2013年碩士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龍寺與西明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Xiang Wang, *Ximing Monastery: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Saarbrücken: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5；Ru Zhan, “The Buddhist canon of Ximing Monastery and Tang China,”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3.2 (2017): 187-93；湛如《唐代長安西明寺與日本佛教》，《中國宗教》2016年第1期，第56-59頁；湛如《西方之明：以西明寺學傳統為中心》，釋妙江、陳金華等編《亦僧亦俗、自內及外：東亞大視野下的佛教與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新加坡：World Scholastic Publishers, 第164-180頁。

¹⁰ 隋唐長安道觀的研究，可參山崎宏《隋の玄都觀とその系譜》，中國思想宗教史研究會編《中國宗教社會》，東京：不昧堂書店，1965年，第1-22頁；另收氏著《隋唐佛教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71年，第66-89頁；布目潮汎《唐代前半期長安における公主宅の道觀化》，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国の都市と農村》，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第203—234頁。比較方便的漢文書籍，可參樊光春《長安道教與道觀》，西安：西安出版社，2002年；另外近年來通過唐代若干重要道觀來研究唐代宗教政策，則可參聶順新《長安開元觀與唐玄宗的都城宗教政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64-70頁。後者介紹了唐玄宗對於長安城中開元觀既利用又控制的矛盾態度。

¹¹ 唐長安祆教寺院可參青木和子《唐代長安の祆教寺院について》，《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1978年第17卷，第94-102頁；彭樹智《唐代長安與祆教文化的交往》，《人文雜誌》1999年第1期，第96-103頁；另西安祆教的遺存則可參楊軍凱《關於祆教的第三次重大發現——西安北周薩保史君墓》，《文物天地》2003年第11期，第26-9頁；關於祆教的總體研究，還可參閱林悟殊《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姜伯勤《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後者則主

也同樣生活著為數眾多的各國宗教信眾。這些宗教場所，也往往與境外保持持久的宗教與文化交流，¹³而異域的僧人，也會在長安城中長久地逗留，從事宗教活動，並且將學習到的宗教知識帶回原來的出發之地。¹⁴

回到佛教中來，就社會功能性而言，中國古代的寺院往往非僅為宗教聚集之場所，同時也具有多重社會與文化功能。¹⁵因此，中古時期，

要是側重於摩尼教研究，對於祆教之研究主要是在此書中“歷史篇”裡收錄的四篇文章。近著則可參張小貴《中古華化祆教考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¹² 長安城中也有著名的景教寺院與碑刻遺存，關於長安之中景教的教堂大秦寺，可參關英《景教與大秦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在西安碑林之中，則存有著名的唐建中二年（781）“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此碑之研究見後，對此碑之釋文，較方便參考者為吳昶興編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新北市：橄欖出版，2015年。對於景教，漢語中較為方便的綜述為朱謙之《中國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上海：東方出版社，1993年。除此之外，尚可參考佐伯好郎，《景教碑文研究》，東京：待漏書院，1911年；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刊，1935年；伯希和著，馮承均譯《景教碑中敘利亞文之長安洛陽》，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34—35頁。Antonino Forte, “The Chongfu-si 崇福寺 in Chang'an: A Neglected Buddhist Monastery and Nestorianism,” in Paul Pelliot,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 edited with supplements by Antonino Forte, pp. 429–472. Kyoto and Paris: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Collège de France, 1996. 段晴《唐代大秦寺與景教僧新釋》，載榮新江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第434-472頁；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¹³ 即以西明寺的海外交往為例，即可參小野勝年《長安の西明寺と入唐求法僧》，《佛教文化研究》1975年第2期，第1-9頁；湛如《唐代長安西明寺與日本佛教》，《佛學研究》2015年第1期，第57-63頁（《中國宗教》2016年第1期，第56-59頁）；Ru Zhan, “The Lineage of Japanese Pilgrim Monk Jōgyō and the Chinese Monasteries Where He Studied in the Tang Period: With Complementary Discussions on Kūkai's Disciples and Ximing Monastery,”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5.1 (2019): 69–83.

¹⁴ 如空海在長安的活動可參松崎惠水《長安における弘法大師空海》，《密教文化》1985年第1期，第21-34頁。春日禮智《慈覺大師と長安佛教》，福井康順編《慈覺大師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0年。與王仁波《唐長安城的佛教寺院與日本留學僧》，《文博》1989年第6期，第13-20頁。

¹⁵ 佛寺的多重社會功能，可參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也包括長安本地的寺院，就承擔了諸多經濟¹⁶、文化與教育¹⁷等社會職能，從而成為了當地民眾日常生活的地域輻射中心之一。因此，我們對於玄奘及相關寺院的研究，就具有輻射到整個中古社會生活史之中的重要意義。

因緣際會，2018年初陝西西安歸元寺的方丈、中國歸元玄奘文化促進會的會長慈光法師也心同此理，熱切地感受到了振興玄奘文化的必要性。因此於2018年8月16-19日由中國歸元玄奘文化促進會主辦，在陝西歸元寺、中國西北大學等機構的大力協助下成功地舉辦了首屆玄奘與絲路文化國際研討會。而“拔地入雲：佛教與東亞宗教”（FROGBEAR）研究項目的諸同仁非常榮幸地能夠參與到會議的組織工作之中。

此次會議可謂是規模空前，除了各級政府領導、學界前輩、社會各界代表之外，正式與會並且提交玄奘相關學術論文者即有52位。這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共有24位，他們分別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蘭州大學、西北大學、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深圳大學等十餘所大學與研究機構；臺灣地區的學者有3位，分別來自中央研究院、國立政治大學與輔仁大學；除此之外以日本參會學者人數最多，共有7位，

¹⁶ 中古時期佛教的經濟與福利經營，可參全漢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業》，收錄於張曼濤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9冊，臺北：大乘文化基金會，1980年，第19-32頁。

¹⁷ 關於佛教，尤其是寺學的教育職能，可參唐代的寺學總論可參賈發義《唐代寺學析論》，《教育學報》2015年第4期，第110-20頁。對敦煌地區的寺學則可參祁曉慶《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寺學教育與佛教傳播》，《青海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第154-159頁；張永萍《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寺學》，《西藏研究》2013年第2期，第58-65頁；以及拙著《中古中國以佛寺為中心的知識孵育與傳播網絡》，釋妙江、陳金華等編《亦僧亦俗、自內及外：東亞大視野下的佛教與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新加坡：World Scholastic Publishers，第116-138頁。

分別來自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駒澤大學、花園大學、龍谷大學、愛知大學與立教大學；另有 5 位來自美國的學者，分別為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楊百翰大學、紐約大學與阿勒格尼學院的學者；有 5 位來自加拿大的學者，分別來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麥基爾大學與薩斯喀切溫省大學；3 位來自印度的學者，分別來自德里大學、賴克瑙大學與那爛陀大學。以及 2 位韓國學者，與來自英國、新加坡與斯里蘭卡的各 1 位學者。從中國大陸之外學者的數量 (28) 也可以看出本次會議的國際性，這也正與我們多年來所推動的國際佛教學術界之間的交流主張相應。我們一直力求打破國界、學科與學人群體之間的隔閡，並以嶄新的視角與多語種、跨地域的宏觀角度，來重新認識佛教文化在中國與東亞大背景之中的展開過程。這次會議，就是我們多年來一系列努力與嘗試中的一環。

在會議結束之後，我們很快收集了經過部分與會者精心草擬的論文。這些論文將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以中、英雙語的形式陸續出版。本論文集集中所收錄的共 26 篇中文論文，也正是這次會議之中的部份以中文或者是從英文研究中翻譯為中文的成果。以下不揣冒昧，先對本論文集的內容稍作簡介。鑒於本集的篇幅，我們將之分為上、下兩編，各收錄論文 13 篇。

玄奘一生之中最難以忘懷並且也畢生貢獻最鉅者，乃是對於印度梵語佛經的精確忠實翻譯，因此我們也將對於玄奘翻譯的相關研究放到了本論文集的卷首。“翻譯”部份的首篇是日本早稻田大學著名印度學、佛教學家山部能宜的《〈成唯識論〉“糝譯”的假設性再探》。此文是直接挑戰法相唯識宗的一個重要傳統舊說：即此宗的根本性論書之一《成唯識論》乃是玄奘參照《唯識三十頌》的多篇註釋後“糝譯”出來的，也即並無一個印度的原本《成唯識論》。而此一文獻本身也確實呈現出

了並列多種譯書的情況存在，故在形式上就響應了這種假說。然而山部能宜卻在研究印度唯識學的其他註釋，如《〈釋大乘論〉分別秘義釋》與《瑜伽師地論疏》之後，發現在這些文獻之中也存在同樣並列多種註釋的形式，因此就質疑傳統說法，認為或許在印度曾有過完整形式的梵本《成唯識論》。此章的第二篇為美國艾奧娜學院白立冰 (Ernest Brewster) 的《生命延續：玄奘對世親和眾賢有關生命延續的文獻的翻譯》，眾所周知，佛教認為有情眾生在此世的死亡並非一定是輪迴形式的終結，故在玄奘以及其他諸多文獻之中都涉及到了生命的延續性問題。而本文即是通過研究《俱舍論》《順正理論》及《顯宗論》中玄奘等的漢譯，以及這些文獻的梵藏本，來廓清這個部派佛教時期的重要理論問題，而從中也可以對玄奘的翻譯風格有所發明。第三篇作者為深圳大學的吳蔚琳，她所研究的對象同樣是玄奘所譯《俱舍論》。此文乃是通過《俱舍論》的梵本與玄奘、真諦二譯之間的對勘，來分析玄奘翻譯相較之下所顯示出來的具體特點尤其是翻譯策略。並希望證明，梵漢對勘研究有必要由語言對勘逐步發展到概念和義理對勘的更高層次。本章最後一篇文章為日本龍谷大學長谷川岳史對玄奘所譯《佛地經論》和《成唯識論》二論的意圖分析。這是因為玄奘所譯論書之中經常有經其手而編譯的痕跡，也即前面山部能宜所研究的“糝譯”問題。作者對 649 年譯出的《佛地經論》與 659 年譯出的《成唯識論》做了細緻的文獻比較，認為玄奘在編譯了《佛地經論》後，又不得不再次編譯《成唯識論》。同時，通過對此二論的解讀，還可以發現玄奘本人對於尚未漢譯的若干印度文獻——戒賢《佛地經註》及安慧《大乘莊嚴經論釋疏》等——很可能也非常熟悉。

本書的第二部分為玄奘相關文獻的文本研究，這其中第一篇為北京大學王邦維的《也談〈大唐西域記〉的“闕文”問題》。此文討論的

是現通行本《大唐西域記》之外，是否真如數十年前學者所言，還存有佚文存在這一問題。作者經過逐條考訂那些其他文獻中的段落，認為將它們當成是《大唐西域記》之“闕文”的理由並不充分。本部分第二篇作者為華中師範大學的張婷，她討論的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成書問題。作者通過比對傳記所載內容及行文語言前後的差異，並考察原傳作者慧立、彥棕的生平活，再輔以其他相關資料，證明此傳中玄奘西行求法內容為慧立所撰，其歸國後太宗朝貞觀年間事為慧立所撰，後又經由彥棕整理改動，至於在高宗朝之事則為彥棕所續。第三篇作者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王欣以《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為例來研究漢文古籍的外譯。作者認為作為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古籍，其外譯就需要譯者除了文字翻譯本身之外，還需要為讀者提供原文豐富的文化背景信息，以創造讀者理解原文的適當語境。與此同時還要充分前言、注釋、註腳、評論、附錄等有效的方式，對原文進行注解和翻譯。

本論文集的第三部分的主題為“文學與藝術”，其中第一篇為日本立教大學小峯和明的《〈大唐西域記〉的日本接受史——以說草、繪卷及說話類書為中心》。此文以日本的唱導資料“說草”這種僧侶在法會上說法時使用的輕便臺本、繪卷《玄奘三藏繪》以及說話類書《榻嶋曉筆》為素材與依據，來考察此三者與《大唐西域記》的關係，並由此來分析《大唐西域記》在日本的接受與流傳史。第二篇為北京大學陳明的《〈大唐西域記〉中的佛教故事及其圖像在絲綢之路的流傳》。《大唐西域記》之中存有許多印度民間文學故事，涉及本生、譬喻、佛傳、傳說等多種類型。此文即從佛教故事地理及其圖像的角度，梳理了其中的故事及其圖像在絲綢之路的傳播網絡。第三篇為清華大學高陽的《淺談東亞佛教的世界觀——從〈大唐西域記〉到〈玄奘三藏繪〉》，此

文之中通過對《大唐西域記》中所描述記錄，以及繪製於14世紀初日本的《玄奘三藏繪》之中的場景入手，簡要地分析了佛教的須彌山世界觀在東亞地區的演變與流傳，以及其對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觀念影響。第四篇美國阿勒格尼學院伍國的論文則是討論《大唐西域記》一書的成立背景及其文本。作者認為《大唐西域記》的內容是來自玄奘對世俗事務的長期興趣，而該書的編纂是因唐太宗命其撰寫西行的記錄，以此為征服和統治西域搜集情報。故該書記載了當地的物產與風俗，這承襲了中國傳統地理書籍中的西部邊疆部分。第五篇文章為首都師範大學于碩的《瓜州東千佛洞、榆林窟中的唐僧取經圖》。此文依據對瓜州東千佛洞和榆林窟中唐僧取經圖的實地考察，來對其圖像的內容與樣式特徵進行分析，並結合元代的取經圖像分析唐僧取經圖在內容與形式方面的變化。最後一篇為浙江大學張利明的《玄奘對觀音信仰的新證據——以甘肅民樂童子寺石窟西遊記與觀音救難壁畫為例》，此文對甘肅張掖民樂童子寺石窟作了詳細的考察與測繪，解讀出了尚未被辨識的西遊記壁畫的內容。同時還結合壁畫的題材選擇和張掖地區普遍流行西遊記壁畫與觀音救難壁畫組合的現象，對壁畫所體現的觀音信仰作了探討。以上即為整個上編之中的全部內容，這些對於玄奘相關翻譯、文本、文學與藝術領域的探討，將極大地豐富玄奘學中這幾個方面的研究範圍，並推進相關方向在深度之上的拓展。

本論文集下編的內容以“義理”、“歷史”與“社會文化”研究為主。本書第四部分為玄奘學的義理研究，其中首篇為武漢大學曹彥的《唯識學的體用觀》，此文主要是討論了玄奘所創基的唯識宗門的體用觀。作者認為唯識學諸法在本質上祇是純粹的功能，而實無法體。而該派創新性地使用 vijñapti 來表示“識”，說明識是一種行為的完成狀態 (siddhabhāva)，故唯識文獻中所謂的“體”與“用”的言論本質上是幫

助人們理解俱時因果關係的譬喻。第二篇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李子捷的《玄奘歸朝以前中國佛教的種姓(性)說——以菩薩瓔珞本業經為中心》。此文旨在探究北涼曇無讖翻譯《菩薩地持經》之後，中國佛教是如何理解種姓學說這一問題。作者考察了種姓說與菩薩修行的階位說之間的關係，並認為在玄奘歸朝以前的中國佛教中，《瓔珞本業經》的種姓(性)說在中國自古雖被認為不合理，卻屬於對種姓思想的主流認知。第三篇為臺灣輔仁大學林佩瑩的《玄奘及其門下弟子勝莊的菩薩戒思想初探》。玄奘翻譯了兩本瑜伽菩薩戒本，分別為《菩薩戒羯磨文》與《菩薩戒本》，皆傳為彌勒所作。玄奘門下多承其風，特別是新羅勝莊，他也曾註釋過《梵網戒本》，並對日本、韓國的梵網菩薩戒發生了影響。此文即詳細比對上列兩本玄奘譯本與另外兩本菩薩戒本，以求深入瞭解兩種菩薩戒系統於玄奘譯本出現後之進展歷史。

本論文集第五部分討論的主題為歷史學考訂，其中第一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薛克翹的《玄奘有關海上絲路的記載》。在此文中作者以《大唐西域記》為材料來源，考察了其中所記錄的印度沿海主要港口、斯里蘭卡、東南亞與波斯及拜占庭。玄奘此記之中的相關內容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的世界地理知識。第二篇為寶雞文理學院劉林魁的《玄奘譯經與唐初三教論衡》。在這篇論文中作者考察了玄奘直接或間接參與的數次三教論衡。這些論爭皆與其翻譯經典有關，更與太宗、高宗的推崇有關。在論衡之中，玄奘既顯示了其廣博的學術修養，又藉三教論衡之機弘揚了佛教。第三篇論文為南京師範大學楊劍霄的《識緯、信仰與慈恩之衰——再論法相唯識宗衰亡問題》，此文考察了以窺基、普光為首的玄奘唯識宗漸次衰落的過程，先是自武則天執政起，因玄奘僧團前朝色彩濃重等原因，而更重西明寺一系。窺基被迫離開長安，唯識宗也逐漸脫離佛教的中心舞臺。玄宗之時，唯識三祖慧沼因犯金

刀之讖及堅持彌勒信仰等因素，正中玄宗禁忌，而又進一步促使唯識宗徹底走向衰敗。第四篇文章為日本愛知大學坂井田夕起子的《南京玄奘遺骨的發現及其“東遊記”》。在這篇資料極其翔實的論文之中，作者考察了二戰末期，侵華日軍在南京發掘出玄奘遺骨後，又由汪偽政權將之帶到日本，分散各地，再到冷戰時期臺海兩岸爭奪玄奘遺骨的若干歷史史實。以此表明，即使是在逝世千年之後，玄奘依然是東亞佛教文化的象徵，在國際關係上也是重要的存在。

本論文集第六部分主題為“玄奘的文化世界”，第一篇為復旦大學余欣的《異物志：龜茲方物的文化想象與中古時代的世界圖景》，其中考訂了來自龜茲的五種珍奇異物：屈支灌、龜茲板、金頗黎、銀頗羅、遊仙枕。試圖將傳統史志、出土文獻、考古發掘實物與域外漢籍互相印證，綜合運用小學、名物考證、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分析等工具進行會通式的研究，以揭示這些寶物作為異文化符號的象徵意義。第二篇文章為新加坡佛學院紀贇的《人主之地、象主之國：大唐語境下玄奘的世界圖景》。此文通過玄奘所記錄文獻，來逐步推演出整個佛教中“中國一邊地”這一概念的發展簡史，在印度它只是出自現實的需要，但隨著佛教在印度以及傳到中國後的形勢變化而逐漸擴展。這種思維模式也與中華文明發生了矛盾與衝突，並最終在不同階層的佛教徒中產生了迥異的影響。第三篇為龍岩學院邱蔚華的《論禪宗語錄中玄奘形象的傳播與接受》。玄奘形象在禪宗語錄中的傳播與接受類型豐富多樣，作者對此作了分類，即高僧大德型、開示弟子參禪悟道的媒介型和禪家弟子引為同調的擬古寄意型等。作者還具體分析了這些形象傳播與接受類型多樣性之成因。第四篇為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國際學院王翔的《玄奘筆下的印度佛教圖書館》。此文是作者探討中國求法僧所見的印度佛教寫本圖書館的系列研究之一，在文中他梳

理和考證了唐代的三藏法師玄奘在《大唐西域記》等書中所記載的有關天竺佛教圖書館的零星資料，初步揭示了那爛陀寺的經藏，以及具有部分圖書館功能的經塔和重閣式的寺院經藏這兩種形態的印度佛教圖書館。本章最後一篇論文為貴州博物館袁煒的《〈大唐西域記〉所見西域錢幣考》，文中作者通過考古資料、傳世文獻、出土文書和錢幣學來考證《大唐西域記》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所見西域錢幣。作者將玄奘所見之流通貨幣分為四類，一是焉耆、龜茲等塔里木盆地諸國的薩珊幣原型銀幣；二是位於中亞和西北印度等原嚙嚙領土的仿薩珊幣型銀幣；三是印度諸國的印度型銀幣；四是薩珊波斯國的薩珊王朝晚期寬緣幣型銀幣。這與當前出土錢幣的分佈特徵相符，也證明了《大唐西域記》對錢幣描述的可靠性。

在全書的最後，還附有西北大學李海波的《2014–2018年玄奘研究綜述》。作者在此文中整理了這五年中以中國學界為主兼具海外對玄奘的研究成果，這不僅為今後玄奘學的繼續拓展提供了便利，也適當勾勒出了近期玄奘研究的趨勢並指出了若干相關問題。

玄奘學研究是一把打開以長安為中心的中古宗教、政治、社會、歷史、文學、藝術等諸多領域的鎖鑰。通過這根主線，我們就可以將六朝隋唐時期的諸多學術領域貫串起來，並以此來推動東亞與世界相關學術領域內的研究。在此一過程之中，我們非常有幸遇到了諸多善知識與助緣。在拙序的最後，藉此良機要特別感謝具有遠見卓識的歸元寺方丈慈光法師、為此次會議提供無私奉獻的歸元寺全體僧眾、歸元玄奘文化促進會的同仁以及協助本次會議的諸學界合作方，尤其是以李利安教授為首的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諸位先進。歸元寺是一座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長安名寺，而自本世紀始慈光法師更是熱心文教，以弘揚中華文化與漢傳佛教文化為己任。尤其難能可貴者，慈光法師還特具

國際學術眼光與寬闊的心胸氣度，這些對於我們推動漢傳佛教學術研究在國際範圍內的全面復興都特具意義！我們也同樣希望藉此機會向踴躍參與本次國際會議的世界各國的學界同僚表達我們最為深摯的謝意，並且期待今後能夠繼續得到你們的鼎力支持！

2020年5月1日草